

PAPERS

ON

SHANGHAI

STUDIES

林克主编

上海研究论丛



第十八辑

上海人民出版社

上海研究论丛

第十八辑

主 编：林 克

常务副主编：朱敏彦

副 主 编：黄美真

沈锦生

上海市地方志办公室 编
上 海 研 究 中 心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上海研究论丛. 第 18 辑/林克主编;上海市地方志办公室,上海研究中心编.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7
ISBN 978 - 7 - 208 - 07606 - 8

I. 上... II. ①林...②上...③上... III. 上海市—地方史—文集 IV. K295.1 - 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7) 第 194544 号

责任编辑 曹勇庆

特约编辑 李彦涛

封面设计 闵 敏

上海研究论丛(第十八辑)

林 克 主编

上海市地方志办公室 上海研究中心 编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ewen.cc)

世纪出版集团发行中心发行 上海市印刷七厂印刷

开本 850 × 1168 1/32 印张 11 字数 300,000

2007 年 12 月第 1 版 2007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 - 7 - 208 - 07606 - 8/K · 1409

定价 30.00 元

目 录

· 纪念孙中山诞辰 140 周年专题 ·

孙中山与上海三题 沈渭滨(1)

孙中山与上海

——用影像再现的历史 张景岳(33)

孙中山《建国方略》研究

——从《实业计划》看孙中山的建国思想心路与实践

..... 俞慰刚(44)

二十世纪初东京与上海在政治思想方面的互动

——以留学为中心 邵 雍(57)

上海总商会档案的历史考证

——兼谈与辛亥革命研究的结合点 王昌范(66)

· 政 治 ·

1927 年上海特别市成立探论 朱敏彦 李洪珍(80)

衙门与治所:明清上海地区的县政 冯贤亮 林 涓(90)

抗战初期的伪上海市大道政府研究 王瑾瑾 杨元华(111)

· 经 济 ·

民国时期上海银行业小额信用放款征信及启示 孙建国(168)

十九世纪五十年代至二十世纪初上海城市交通管理

..... 何兰萍(177)

重论轮船招商局创办的历史意义 陈 潮(199)

· 文 化 ·

上海城市文明的底蕴和本质特征 滕志刚(207)

上海纪念黄道婆场馆纪略 陈 云 苏智良(219)

· 社 会 ·

上海华界公共卫生管理初探(1927—1937) 彭善氏(228)

民国时期上海乞丐群体成因探析 罗国辉(248)

一·二八淞沪战争与瘟疫 刘雪芹(259)

· 团 体 ·

旧上海新闻社团的嬗变 马光仁(268)

二十年代妇女节制会在上海的活动 李丽娟(297)

· 人 物 ·

虞洽卿与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 肖阿伍(307)

· 资料整理 ·

民国初教育家李廷翰史料钩沉 许洪新(319)

《申报》和《大公报》有关民国土匪评论文章目录选编
(1912—1926) 徐有威 吴乐杨(333)

孙中山与上海三题

沈渭滨

孙中山一生与上海关系密切。据统计,自 1894 年为谋求中国改革上书李鸿章,第一次到达上海起,到 1924 年应邀北上商讨国是,途经上海,前后共有 21 次在上海逗留^①。其中,以 1917—1921 年居住上海,著书立说并与共产党人商讨国共合作的一段经历,为时最久、意义重大。但是,武昌起义后由海外回国在上海的一段时间,对催生中华民国南京临时政府,奠定共和体制,具有里程碑意义。值此纪念孙中山诞辰 140 周年之际,本文即以这一时段内孙中山与上海的关系,选取三题,略作述论,以与研究上海史学者切磋。

为了理解孙中山何以要回国,有必要先概述一下他于武昌首义前后在国外的活动情况。

孙中山是在 10 月 12 日从美国丹佛市的报纸上看到“武昌为革命党占领”消息的。这一消息使他极感意外,又极为振奋。

所谓意外,是因为他一贯把革命首义之区放在两广云南边疆,不认为长江流域会有条件起义。当四川保路运动兴起后,他还和黄兴等人策划云南响应^②。10 月初,黄兴曾有密电给孙中山,告诉他,总部在听取武汉同志汇报后,决定改变云南响应四川的计划,支持湖北

^① 参见上海市历史博物馆、上海市档案馆编:《孙中山与上海:文物文献档案图录》“孙中山在上海革命活动大事记”,上海书店出版社 2006 年版,第 284—285 页。

^② 黄兴:《复同盟会中部总会书》(1911 年 10 月 3 日),湖南省社会科学院编:《黄兴集》,1981 年版,第 63 页。

首先起义^①。但这份电报因夹在行李箱里先期运走,孙中山未能译出。10月11日孙中山到达丹佛,译出电报,曾想致电黄兴,劝湖北同志勿动,不同意湖北发难^②。10月12日电报尚未发出,而当地报纸已报导武昌被革命党人占领的消息,这使孙中山大感意外。

所谓振奋,是他预感武昌发难,意味着清朝覆灭的命运已定。他看到报纸消息后立即于次日(即10月13日)赶到芝加哥,以“同盟会芝加哥分会”的名义,发布了“预祝中华民国成立大会”的布告^③。定10月15日开会,希望各界侨胞届期“齐临庆祝”。这是孙中山对武昌首义作出的第一个反应。当时还没有任何一省响应武昌起义(首先响应的是湖南省,在10月22日起义成功),他已敏锐地看到武昌起义后清王朝必定垮台,民国必将诞生的前景,说明他确实具有深刻的判断力和观察力。

武昌起义成功后,孙中山对自己的去留进行了认真思考,作出了自己“应当尽力于革命事业者,不在疆场之上,而在樽俎之间,所得效力为更大也,故决意先从外交方面努力,俟此问题解决后再回国内”^④。这是孙中山作出的第二个反应:留在海外,为未来的新政权寻求欧美列强与承认和支持。应该说,这个决定,对孙中山本人来说是个“扬长避短”的决定。

孙中山在同盟会成立后虽策划过多次反清武装起义,但几乎没有一次是在他亲自指挥下进行的。而他作为中国革命的公认领袖,长期流亡海外,使他与各国的政界、商界有广泛接触。这一点,可以说党内没有任何人能与之媲美;加上当时所有的革命党人,对能否取得列强的外交支持相当重视,这虽说是一种幼稚的想法,却是半殖民

① 黄兴:《致冯自由书》之二(1911年10月5日),《黄兴集》,第66—67页;孙中山:《有志竟成》,《孙中山全集》第6卷,第244页。

② 孙中山:《有志竟成》,《孙中山全集》第6卷,第244页。

③ 孙中山:《中国同盟会芝加哥分会预祝中华民国成立大会布告》(1911年10月13日),《孙中山选集》第1卷,第542页。

④ 孙中山:《有志竟成》,《孙中山全集》第6卷,第244页。

社会中,一个软弱的阶级级力量渴望战胜敌手的最易产生的心态。

孙中山认为,列强与中国有关系而且影响较大的有六个国家,即美、法、德、俄、日、英。这六国可分为三类:第一类是法国、美国,孙中山认为他们是同情中国革命的;第二类是德国、俄国,是反对中国革命的;第三类是英国、日本,其中英国是民间同情而政府摇摆不定,日本是民间同情而政府反对。六国中,对中国举足轻重成败所系的是英国,若英国政府支持中国革命,必可制约日本。于是他决定由美赴英进行外交活动。

孙中山的外交行程,是由美国到英国,由英国到法国,然后由法国马赛乘船回国。一路上,他从美国纽约到华盛顿和美国政府接触,并未获得成功^①;又托人与日本驻美国纽约总领事联系,日本总领事表示若孙中山改名,则在日本登陆或逗留都可以^②(因为孙中山已被日本政府下令驱逐)。但孙中山表示自己不愿意改名,要以公开身份赴日,此事也就不了了之。

11月2日,孙中山离纽约赴伦敦。11日到达,曾进行一系列外交活动,目的是寻求英国对新政权外交上、经济上的支持。结果也没有成功^③。11月下旬,孙中山离伦敦抵达巴黎,在巴黎逗留三天,广泛接触了在法国在野派的报界、银行家,但没有取得任何实质性的收获^④。法国与英国一样都表示了所谓“中立”的姿态。

孙中山的外交努力,虽然在政治上、经济上都没有取得成功,但此行不无意义。一是知道了各国对中国革命的态度,大都表示中立;二是他从英国政府那里得知列强支持的是袁世凯。英国表示,袁世凯如果能废除清廷、赞成共和,所有外国人将支持袁世凯获得总统的

① 孙中山:《有志竟成》,《孙中山全集》第6卷,第245页。

② 孙中山:《与鹤永太郎的谈话》(1911年10月24日至26日间),《孙中山全集》第1卷,第543—544页。

③ 关于孙中山在伦敦的外交活动,可参见拙著《孙中山与辛亥革命》,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二版,第439—443页。

④ 参见张振鹄:《辛亥革命期间的孙中山与法国》,《近代史研究》1981年第3期。

职位。这两条对孙中山的思想都有影响。

第一条,英国等表示所谓“中立”,这使孙中山认为可乘列强不干涉中国革命的有利时机,回国抓紧部署立国的大计。

第二条,列强支持的是袁世凯,这使孙中山觉得可以利用袁世凯赞成共和,废除清廷,实现共和政府的大业,自己则当不当共和国的总统无所谓。

正是在这种考量之下,孙中山决定从速回国,部署一切;也是在这种心态之下,孙中山已经有以民国大业为重、个人进退无所谓的心态。所以,后来他让位给袁世凯是顺理成章的事。

一、孙中山自海外回国后,为什么坚持要到上海?

1911年11月24日,孙中山由法国马赛港乘“地湾夏”号邮轮回国。

12月21日,孙中山到达香港,广东都督胡汉民、枢密处廖仲恺等到港迎接。接回广州后,孙中山当天与胡汉民彻夜长谈。当时胡汉民希望孙中山留在广东,大意是若孙中山到上海去,必然被推戴为政府首脑,而政府必定设在南京,你手中又没有兵力,用什么力量进行北伐,直捣黄龙?不如留在广东,整编广东各军,然后挥师北伐,定能稳操胜券。袁世凯即使倾其全力,二三个月内也未必能摧毁东南起义各省;而我们利用这段时间,整备军力,定能以实力廓清强敌,真正实现南北统一^①。

显然,胡汉民认为孙中山应留在南方。在他看来,孙中山与其做个手中无兵的总统,不如当一个有兵有权的地方实力派,然后挥师北伐,实现南北统一。

孙中山不同意胡汉民的分析,他认为,以形势而论,沪宁是前方,广东是后方,自己若不亲临前线,不仅是避难就易,而且一定会使等

^① 《胡汉民自传》,《革命文献》第3辑,总425—426页;参见《近代史资料》1981年第2期。

候自己的同志失望。这里有一个细节必须说明,孙中山自马赛乘船回国时,曾经把自己的行程、所到之处都打电报告诉了上海革命派的喉舌《民立报》,《民立报》得电后立即全文发表,所以,孙中山回国,何时到香港的消息,上海人早已知道,都热切盼望他到上海来。他向胡汉民指出:目前,湖北方面内部已有矛盾,南京各省代表会议则纠纷甚多,如果自己不去上海,等于把这两方面拱手送给敌人,有利形势完全失去之后,再举兵北伐,怎么能说得计呢?朱明末局,正因为东南不守,粤桂遂不能支,我们不可重蹈覆辙。现在革命军有不可阻挡之势,而列强仓猝之间,无以为计,只得守其向来局外中立的惯例,不为干涉,我们为什么不利用这有利形势实现共和的目标呢?袁世凯诚然不可相信,但我们正可利用他推翻专制的清王朝,这比用兵十万要好得多。即使他助清王朝为恶,但我已稳定,而彼之基础已远不如前,推翻他自然比较目前容易。所以目前我们可以先成一圆满之段落。若自己不去沪宁,“则此一切对内对外大计主持,决非他人所能任”。他希望胡汉民与自己一起去上海^①。

可以看见,孙中山对当前时局估量的基本出发点是利用列强目前中立的态势,利用袁世凯在共和与君宪问题上首鼠两端的心态,争取时间迅速完成推翻清王朝、实现共和政体的大业,即利用袁世凯推翻清王朝以建立共和国的办法达到目的。孙中山的这一设想,从根本上说,显然是担心武力北伐推翻清王朝将会招致列强干涉的不堪局面,而实现这一计划,也就包含着必须把共和国元首的位置让给袁世凯,作为代价,或作为诱饵,使袁世凯去推倒清王朝。

这里必须说明孙中山与胡汉民对话时的上海形势。当时,上海早已光复,建立了以同盟会中部总会领导人陈其美为首的沪军都督府。孙中山曾指出:武昌起义后,“响应之最有力而影响于全国最大

^① 孙中山:《与胡汉民、廖仲恺的谈话》(1911年12月21日),《孙中山全集》第1卷,第569页;《胡汉民自传》,《革命文献》第3辑,总426页;《近代史资料》1981年第2期。

者，厥为上海”^①。可以说，上海光复是辛亥革命的转折点。其作用有以下四点：

第一、上海光复促成了苏浙独立和加快了攻占南京的进程，从而形成了以上海为中心的江浙革命区域。而江浙革命区域的出现，又使已经独立的湖北、湖南、江西三省与下游连成一片，不仅减轻了武昌地区的压力，而且造成了长江流域的强大革命声势。

第二、上海光复切断了清军的军火供给来源和南北交通，并迫使海军反正，从而在军事上直接支援了首义之区，为各省光复减轻了压力。清军的军火来源，除直接购自外国外，在国内主要靠汉阳枪炮厂和上海江南制造局，两者，尤以江南制造局为最大军火工业。清政府的陆路交通，主要靠南北铁路大动脉京汉、粤汉两线相接。武昌起义后，南北交通中断，清政府依靠沪杭铁路北连济南、北京、南连粤汉作为陆上通道。上海光复，接管沪宁车站，再次切断了这个补充干线。清海军由萨镇冰统长江舰队赴汉口镇压起义，其中一部分兵舰留泊上海杨树浦、高昌庙等处。上海光复，李燮和等策反了留沪的军舰反正，使萨镇冰赴汉的军舰首尾不能相顾，加以舰队官兵同情革命，不愿出力进攻武汉，于是萨镇冰不得不率舰队下驶，在九江宣布反正。

第三、上海光复，使以张謇为首的立宪派加速了倒向革命的步伐，清政府因而陷于彻底孤立。在立宪派争取立宪运动中，江浙预备立宪公会是最有号召力的国内立宪团体。三次大规模的请速开国会的请愿活动，主要是由它发动的。其首脑人物张謇，是立宪派的人望。他在武昌起义后，还到南京劝说两江总督张人骏派兵赴武汉镇压革命，又到苏州，代程德全起草速开国会以收拾人心的奏疏。上海起义前，他回到南通观望形势，直到上海光复，才由南通抵达上海，表示拥护共和，倾向革命，并通电劝说袁世凯等归顺革命。以他为首的江浙立宪派联合起来，向清政府劝说行共和，废君主立宪，这就使清政府陷于彻底孤立，成了真正的孤家寡人。

^① 孙中山：《有志竟成》，《孙中山全集》第6卷，第244页。

第四、上海光复,使革命的领导中心发生转移,从而为南北议和、建立南京临时政府创造了有利条件。

领导中心东移上海,一方面固然与革命派争夺领导权有关,另一方面确实也有客观上的原因。

首先,武昌革命党的领导机关,早在起义前已遭破坏,以致首义后没有一个足资号召的革命党人出来领衔压阵,黎元洪毕竟是个旧军官,在全国革命党人心目中显然不足以代表革命派。在这种缺乏人望的情形下,武昌不可能长期保持重心的地位。

其次,自广州黄花岗之役失败后,同盟会总部已经涣散,而同盟会中部总会事实上已取代了总部的领导。它设在上海,成为长江中下游各省革命组织的核心所在。上海光复,事实上成为革命党人的荟集之区,无形中已经成为领导中心。

再次,武昌首义后不久即遭清军围攻,能否保卫,前途未卜,人心惶惶。上海为华洋巨埠,既有江浙为之拱卫,又有租界可资利用。从安危角度考虑,上海确较武昌为优。所以,当各省都督代表会议在武昌召开不久,便移至南京了。会议虽在南京,中心却在上海。

最后,上海及江浙区域不仅经济实力雄厚,百业兴旺,而且在外交往方面也具重要地位。加上革命派在全国最有影响的报刊都集中在上海,进行舆论宣传以扩大革命影响,也较武汉更为方便。

所有这一切,使得光复后的上海,很快成为革命重心,南北议和及酝酿临时政府组织等决策都要在上海进行。孙中山坚持要到上海,也就可以理解了。

二、孙中山抵沪后的行止与活动

12月25日,孙中山偕胡汉民等乘“地湾夏”号邮轮到达吴淞口。时值细雨,海口有雾。沪军都督府派兵轮“建威”号往吴淞口迎接。此事,上海《民立报》有所报导:

先生乘香港船入港,沪军都督府派建威兵轮,由沈参谋虬斋往吴淞

口迎迓。时值细雨如织,海口雾集,致建威升旗时,该舰不及瞭见停轮。

孙先生偕美将郝门李(沈案:即通译荷马李上校)夫妇同行,又有日本同志随孙先生来华者六人(原按:即宫崎寅藏、池享吉、山田纯三郎、太田三次郎、群岛缝次郎、绪方二三),又有国人随孙先生来者十人,其姓名如下:胡汉民、谢良牧、李晓生、黄子荫、陈琴舫、朱本富、余森郎、朱卓文、陆文辉、黄菊生。孙先生登岸,即由黄宗仰先生招待,至哈同花园午膳后,由伍外交总长(沈案:即沪军都督府外交总长伍廷芳)互商政要。黄元帅(沈案:即黄兴)、陈都督及胡都督汉民、汪清卫诸君同往。^①

上述《民立报》报导,虽记述了与孙中山同行的日本志士六人及伴同孙中山来沪的广东方面十人,但对孙中山如何上岸及上岸后的行止,未有具体报导。当时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的“警备报告”,可以补此不足:

孙逸仙搭狄凡哈号(S. S. Devanha)抵沪,由一艘悬挂两面革命军旗子的专用汽艇将其接至租界码头,然后乘坐176号汽车驶往静安寺路哈同公馆。孙在哈同公馆接见了伍廷芳先生及其他来客约三十人,后于下午二时三十分前往爱文义路(沈案:今北京西路)100号伍廷芳寓所,并一直停留至下午四时二十分。晚上,孙在戈登路(沈案:今江宁路)7号彭济时家^②与友人共进晚餐,至夜晚十一时离去。孙现住宝昌路(沈案:今淮海中路)408号,此屋系法国人屠榭(Toche)之产业。^③

① 《民立报》1911年12月26日,转引自王耿雄:《孙中山史事详录(1911—1913)》,天津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62页(以下称“王耿雄书”不另注明)。

② 《辛亥革命期间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警务报告》,《历史档案》1981年第4期,转引自王耿雄书,第63页。由于本报告原文是英文,“彭济时”为中译名,应为“庞青城”。

③ 《辛亥革命期间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警务报告》,《历史档案》1981年第4期,转引自王耿雄书,第63页。由于本报告原文是英文,“彭济时”为中译名,应为“庞青城”。

从这份“警务报告”可知,孙中山并非由“建威”兵轮送上码头,而是由一艘专用汽艇送至租界码头的。洋鬼子办事确实认真,连乘坐汽车的号码、伍廷芳寓所门牌及逗留、离去的时间,都记录下来,使后人能了解 12 月 25 日孙中山等抵沪的具体情况。

那么,沪军都督何以知道孙中山要来上海? 原来,孙中山到广州的当天晚上与胡汉民彻夜长谈后,胡知孙去上海意决,即发电报:“上海陈都督、黄元帅鉴:汉民到港接孙先生,同座英邮船到申,乞招待。汉民叩。”^①陈其美接电后即作出安排,并以宝昌路 408 号作为行馆。

至于孙中山登岸后为何不直接去行馆安顿将息,而去了哈同花园? 这可能与乌目山僧黄宗仰有关。上海《申报》12 月 26 日有一则报导称:“孙中山于初六日(沈案:即 12 月 25 日)上午九点三刻抵埠,由公共租界三马路(沈案:今汉口路)外滩登岸。抵沪后由黄宗仰、谢蘅窗、陈根香向宁波轮船公司商借江利轮,于初五日开至吴淞欢迎。翌晨,随英公司船停泊吴淞码头,即由三君接上江利轮驶至三马路海关码头。上岸时中西人士手提快镜摄影,并脱帽致敬者甚多。孙中山即乘汽车至哈同花园中膳,一时车马盈门,甚为热闹,黄兴、伍秩庸与各省都督均往见,颇形欢洽。”^②这件报导与工部局警务报告、《民立报》报导可以互证:建威号因雾,“故特凡哈(沈案:即地湾夏,亦即狄凡哈)轮船驰过时竟未之见”^③;同时往吴淞口迎接之“江利”号商轮却接到了孙中山一行。然后由专运汽艇至租界码头。因为宁波轮船公司船只按规定只能停靠本公司的码头,是不能直接停在租界码头的,所以沪军都督府才用悬挂革命军旗的专用汽艇驳接。此举显然得到公共租界工部局的同意,才会有工部局警务报告述职一事。尽管我这一解析没有资料佐证,但将多种报导和警务报告串读,估计不会大错。

① 《申报》1911 年 12 月 23 日,转引自王耿雄书,第 60 页。

② 《申报》1911 年 12 月 26 日,转引自王耿雄书,第 62—63 页。

③ 《申报》1911 年 12 月 27 日,转引自王耿雄书,第 61 页。

孙中山在租界码头上岸后,接受了记者采访。现存资料只有《民立报》一件,即《与上海〈民立报〉记者的谈话》。孙中山说:

“武昌举师以来,即由美旅欧,奔走于外交,财政二事。今归海上,得睹国内近状,从前种种困难虽幸破除,而来日大难尤甚于昔。今日非我同人持一真精神、真力量以与此困难战,则过去之辛劳将归于无效。”(《民立报》记者报导:孙中山“并言在欧洲时破坏清政府借款事甚详”。)①

报导虽仅寥寥数十字,却真实写出了孙中山在海外活动的重心与他回国后的担忧。当时孙中山最担忧的不是袁世凯掌握政权的问题,而是未来新政权的财政问题。他在新加坡停泊期间,曾约请一贯资助革命的南洋华侨邓泽如等在船上相见。向他们说明自己之所以迟迟归国的原因是为了“要在欧洲破坏清政府借外债镇压革命,又谋求新政府借得外债”。表示这次到上海,要向各国去解释“借洋债有万利而无一害”,因为今天新政府要巩固,“非得五亿元不能建设裕如”,希望华侨一本初衷,将来对新政权给予经济上支持②。后来,南京临时政府显现的财政困难,证实了他的预见正确。

接受采访后,孙中山一行偕黄宗仰等乘车去哈同花园午餐。

黄宗仰既是个出世的僧人,又是个入世的革命者。他不仅与孙中山关系很好,两人时有通信往还,而且也是哈同夫人罗迦陵的座上客。由他出面在哈同花园为孙中山接风,是合适的。哈同虽为犹太富商,但性喜附庸风雅,文人雅士常以哈同花园为聚会之所。孙中山名闻海内外,是革命党领袖,哈同当然乐意提供场所,把迎宾的第一

① 《孙中山全集》第1卷,第571—572页。

② 孙中山:《与邓泽如等的谈话》(1911年12月16日),《孙中山全集》第1卷,第567页。

站置于此,既可显示自己的身价,又可拉近与革命政府的距离。他甚至还让孙中山当夜留宿于哈同花园,只是因为宝昌路行馆已经为沪军都督府所准备,又承法租界工部局将电灯线接齐,“布置周至”^①,孙中山向哈同表示感谢后^②去了伍廷芳寓所。当夜十一时,孙中山告别了晚宴东道主庞青城后,到宝昌路行馆休息。至此,结束了抵沪后第一天劳累困乏的活动。

12月26日,这是孙中山在上海活动中最富有重大意义的一天。

这天,孙中山接受美国人在沪所办的英文日报《大陆报》主笔的采访,其中有如下对话:

主笔:君与日本政府有关系否?

孙:吾辈将与各国政府皆有关系。吾辈将建设新政府,岂不愿修好于各国政府?

主笔:君是否中国民主国大总统之候补者?

孙:吾不能言。

主笔:郝门李君告我,君由十四省代表请至中国作大总统,其说然否?

孙:既李君如是相告,我不赞一词。

主笔:君带有巨款来沪供革命军乎?

孙大笑:何故问此?

主笔:世人皆谓革命军之成败,须观军饷之充足与否,故问此。

孙:革命不在金钱,而全在热心。吾此次回国,未带金钱,所带者精神而已。

主笔:革命军中有内江否?

① 《民立报》1911年12月26日,转引自王耿雄书,第62页。

② 孙中山:《与〈大陆报〉主笔的谈话》(1911年12月25日至26日间),《孙中山全集》第1卷,第572—573页。

孙：吾辈从无内讧之事。《大陆报》中或有言内讧者，吾党中无此事也，黎都督曾派代表十人来此致欢迎之意，各省皆然，更安得有内讧之事？^①

这些对话，涉及四个方面：一是未来新政府的外交将愿与各国修好；二是未来新政府的总统人选，孙中山避而不答，但从《大陆报》主笔问话中，已经有非君莫属之意；三是关于是否带有巨款，孙明确表示革命成败不在金钱，而在是否有敢于将革命进行到底的精神；四是革命阵营的团结问题，孙断然否认内哄之说。

这四个方面都是中外瞩目的重大问题。孙中山对经费问题一直予以严重关注。前引来沪前曾约见爱国华侨邓泽如商讨措筹经费，是其一例。孙中山是个现实主义者，更是个理想主义者。在无巨款可得情况下，就物质与精神关系而言，他更看重精神。所以，他在昨天回答《民立报》记者的谈话和今日与《大陆报》主笔的对话中，都强调了精神的重要，前后的思想是一致的。这表明他确实具有比一般人高一个层次的革命情怀。

至于革命军中有无“内讧”，孙的回答十分策略。就当时的情势言，党内确实已有矛盾。胡汉民在其《自传》中称：

国内同志以先生既归，乃共谋建立政府，举先生为总统。时章炳麟、宋教仁已先在沪。章尝倡言若举总统，以功则黄兴，以才则宋教仁，以德则汪精卫，同志多病其妄。章又造为‘革命军兴，革命党消’之口号。盖章以革命名宿自居，耻不获闻大计。其在东京破坏军器密输之举，党未深罪之，章仍不自安，阴怀异志。江浙之立宪派人，如张謇、赵凤昌、汤寿潜之属，阳逢迎之。章喜，辄为他人操戈，实已叛党。钝初居日本，颇习政党纵横之术，内挟克强为重，外亦与赵、张、

^① 孙中山：《与〈大陆报〉主笔的谈话》（1911年12月25日至26日间），《孙中山全集》第1卷，第572—573页。